

面条起源于中国，品种数以千计，世界各地都有它演绎的人生。我不是美食家，却记得自己人生中的几碗面五味俱全。

最亲切的当然是母亲做的手擀面，小时候，白面还很稀罕，常年吃玉米面、高粱面、豆面和地瓜干，尽管我们家祖上做过白面馍生意，和面用的大陶瓷盆，宽厚的面板，粗壮的擀面杖，笨重的切面刀一应俱全。

做手擀面先是和面，舀上几瓢面粉倒在大陶瓷盆里，慢慢加水，还要面净、手净、盆儿净。和好的面粉醒醒一会儿，放到案板上揉搓，擀成韭叶厚的面片，再叠起来切成细条，下到开水大铁锅里。

软糯细滑的口感，再配上几根自家腌的老咸菜，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。

“机器面条”适合做凉面，时节上非得等人伏以后。吃的时候多加蒜，防拉肚子。母亲把面条下到锅里，才呼唤父亲打水。父亲顶着烈日，把深井里冒着凉水的水桶挑到灶边，面条刚好出锅。用凉水过三五遍，盛到碗里，加上黄瓜丝、香椿段、腌胡萝卜丁等菜码，再淋香醋蒜泥麻汁，拌匀了吃下去，如同炎炎夏日美味的冰淇淋。

后来，出去上学了，最难忘的是高三那年的“夜面条”。那几年正长身体，活动多、饿得快，下了晚自习，饿得前心贴后心，只好钻被窝睡觉。好在那时候语文老师的夫人开始做“夜面条”了，在自家小厨房煮清汤面。虽然没有桌子、凳子，我们都是站着或蹲在灶台边吃完那碗面条，我们却乐此不疲。

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去邻县城复读，伙食不是一般的差。在这里就是好好学习的，哪能讲究吃吗？每天就是做题考试，吃的什么已经没有了记忆了。

学习再忙也有松口气的时候，同学们就相约去电影院旁边的兰州拉面馆去吃碗面。那个馆子是一个很长的屋子，里面摆满了长条的桌凳，买面不直接收钱，而是要先买一个类似于游戏币的面牌，交给拉面师傅，才会给你一大碗拉面。

那是怎样的一碗面呢？一清、二白、三绿、四红、五黄。清的是汤清，白就是白萝卜片，绿是香菜、蒜苗，红是辣椒油，黄是面条黄亮，冒着热气，上面漂着薄薄几片牛肉，趁热加上大个的米醋，还没有入口，那股香味浸染着鼻腔的每一个细胞。

在这之前，没有过这种吃法，醋可以随便加，辣椒油能随便放，居然不要钱。牛骨清汤的鲜香，大量香醋的酸爽，豆瓣红油的辛辣，组成的复合味道舒畅口腔里每一株味蕾。这种感觉刺激全身的每个汗毛孔，有着通透的快感。

在复读班里，我们敢偷偷溜出去，吃这么一碗色彩斑斓、味道丰富的兰州拉面，也稍稍给自己一丝喘息。虽然这一顿“饕餮盛宴”要付出每天少吃一个馒头饿肚子的代价，我认为也是值得的。我要好好学习，上大学，找工作，挣了钱，天天吃拉面！

考上大学之后，天天吃面的理想却没实现。学校驻地的主食是煎饼，水分少、较干燥，形态似牛皮，却口感筋道，食后耐饥饿。

据说食用煎饼需要较长时间的咀嚼，因而可生津健胃，促进食欲，促进面部神经运动，有益于保持视觉、听觉和嗅觉神经的健康，延缓衰老。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，煎饼给我的感觉就是直到牙齿嚼不动了，才算吃饱。偶尔在学校食堂吃碗刀削面解解馋，就算吃面而已。

真正能够让我行我素吃面条的时候，却是我对面条最没好感的时光。刚上班的那一年，医院里没有住的地方，亲戚给我找了一间破产公司的办公室当宿舍。那间屋子在三楼，西面有个硕大的窗户，没有窗帘，西晒厉害。

夏天我把凉席藏在床底下，晚上睡觉还跟烙饼一样。在这样的地方吃饭就更不用说了，我有一个在实习时买的小电炉，就在上面用小锅做面条吃，吃的最多的就是“蒜香面”。在老家带来的一兜子做种子剩下的小蒜瓣，当做“葱花”。

一般是早上不吃饭，午饭半斤“蒜香面”，晚饭半斤“蒜香面”。这样的食谱一固定下来就是几个月，但食物的搭配有它的规律，比如做面条，有水萝卜丝、茄子丝炆锅面，最简单也得用香葱啊。

不管从味道上，颜色上，“蒜香面”都是个另类。但是，没有办法，我的工资只有271.4元，单位上的人情道往，女朋友还在外地上大学，又不好意思给家里伸手要钱。就这样，只有女朋友来看我的时候，我们炒上4个菜，开顿洋荤，剩下的时光，就只有“蒜香面”了。

虽然被“蒜香面”恶心了不短的时间，我还是对吃面无悔初衷。在济南进修时，我们喜欢去省立医院后面的西市场吃手擀面。看来没感觉到特别好吃。有轮回的，依然忘不了小时候母亲做手擀面的影子。那是一个夫妻小店，当街一个铁皮大案板，还是一样的流程，但是面条切得很粗。有两种浇头，一种是猪肉丁，太过油腻；一种是鸡肉丁的，太过辛辣。完全没有母亲做的手擀面的味道，去吃它不仅是为了怀旧，更为了省钱，那时候还没结婚，日子过得依然紧巴巴。

直到年逾不惑，虽然不敢说走过南闯过北，也算是去过一些地方，品尝过武汉热干面、宜宾燃面、北京炸酱面、山西刀削面、延吉冷面、河南烩面等许多有名的面条，但终究没感觉到特别好吃。真应了祖父在世时说的一句话，“吃好东西吃得牙根子黄了，饿上3天，吃顿烟熏菜都觉得香。”

是啊！过去，吃碗面条就是一种奢望，一种追求，甚至它竟成了我特有的量衡，家人买稍贵一点的东西，我就会用面条的标准去评判，“买这么个东西的钱，能买几斤面条？够咱们家吃多少天？”这样的口头禅就会不经意间说出来。

今天想吃上一碗面条，已经是太简单的事了。然而，一粒沙子可以折射一个世界，一碗面可以见证一段历史。这人生的几碗面，融进了太多亲情、爱情、人情，也融进了苦涩与抗争、知足与感恩，只有不忘初心，憧憬未来，才能活出更精彩百“面”人生……

梁祝杂技剧在江南演绎济宁爱情

本报记者 刘帝恩 宜兴图文报道

成了黑白两方的比武。这些都是根据杂技剧在舞台上的特点所设计的，概括起来就是“文戏武演”。

剧中设计了几场对决：元宵节偶遇马文才仗势欺人时梁山伯出手相助，基于杂技技巧的一步提升营造出双方激战愈演愈烈态势；学堂中的楹联比武，以幅喻笔，两组演员通过中幡技巧进行“写比拼”；求亲抗婚时马车化作的摇摆爬杆上的对峙，梁山伯与众学子的表现都令人耳目一新，尽显青春蓬勃朝气与侠义之风。因为情节紧凑，动作设计富有张力，观众就能融入其中。杂技剧《梁祝》突出了国风设计和中式美学，一面大屏风，声、光、电的融入，都让“济宁爱情故事”更有韵味。

时间回到7月5日上午。济宁杂技团的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剧场，开始装台和相关调试。这在本次巡演过程中，已是常态化工作。济宁市杂技团副团长姜刚向记者介绍，6月初，团队赴深圳参加了金菊奖比赛开幕式演出后，开启了6省10市的巡演。演出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不少场次间隔只有2天，这就意味着团队一天晚上还要演出，紧接着第二天上午就要到另一个城市去装台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连轴转”。剧组配备了两辆大货车，一辆7米，一辆13米，装载着舞台道具，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城市间穿梭。

“观众反响非常好，可以说是场场爆满，让上海站虽然下了暴雨，却还是座无虚席，这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。”灯光师群洋说，因为每个场地规格大小各不相同，灯光每场都要重新校准。杂技剧和音乐剧、舞台剧不同，不仅要展现艺术特点，还要照顾到演员表演，如果灯光太刺眼，就容易导致演员发挥失误。

7月6日下午，宜兴市保利大剧院举办了“探班”活动，不少观众来到后台，与济宁杂技团的演员亲切互动，探究杂技剧幕后的工作。在看到剧组精心准备的道具，了解到杂技演员为了演出要用三四个小时化妆后，不少观众都对济宁杂技团的专业和诚意竖起了大拇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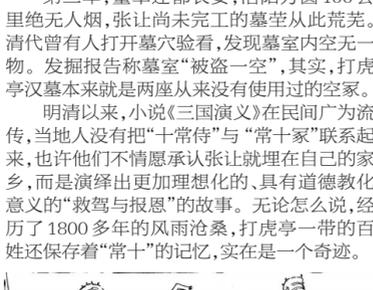
7月6日晚的演出精彩纷呈，每有新的场景转换和高超技艺，观众都会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从祝英台女扮男装离家求学，到与梁山伯偶遇、共读，最终梦断而化蝶，杂技中的单手倒立、蹬技、手技、杆技、高空技巧等轮番变幻出场，剧情节流畅，人物特点鲜明，让观众目不暇接。

济宁是孔孟故里、儒家文化发源地、水浒文化发源地，也是梁祝传说的发源地之一，自古以来文武并重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梁山伯6岁开始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从小爱读书，也爱习

武。杂技剧《梁祝》颠覆戏曲中梁山伯的文弱书生形象，把梁山伯塑造成文武双全的人物，突出了侠骨元素，让观众直呼巧妙。梁山伯与马文才的对决，既是比武，又是比舞，将技巧与情感巧妙结合，凸显了人物张力。

剧中有许多细节布满了剧组的“小心思”，也给了观众诸多惊喜。比如马文才的手下殴打梁山伯，临走前踢了梁山伯一脚。摇头晃脑的他有着一个“放荡不羁”的发型，让许多小朋友大喊“大坏蛋”。

“我们在对接演出安排时就向主办方强调，一定要去南方，因为南方不少城市都以为梁祝是他们的，并不知道梁祝也是济宁的。”赵建刚表示，此行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将“济宁爱情故事”带到全国各地，向大家展现济宁的梁祝文化和杂技文化的魅力，推广济宁文化，讲好济宁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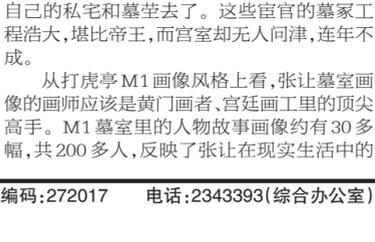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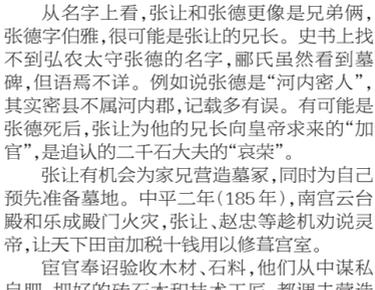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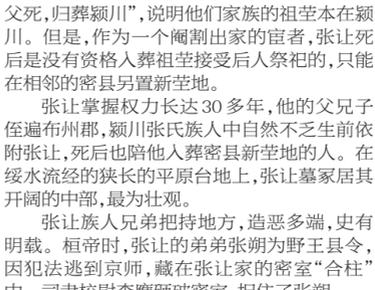


整地演绎梁祝故事，在全国尚属首次；另一方面，济宁杂技团的杂技剧《梁祝》通过对剧本和节目形式的创新，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让济宁梁祝爱情故事深入人心，这让宜兴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十分羡慕。

济宁杂技团团长赵建刚在接受《文化周末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杂技剧《梁祝》的创作灵感，来源于杂技魔术《梁祝》。祝英台女扮男装一秒换装的简单情节，催生了赵建刚要完整演绎梁祝故事的想法。他请来多位专家参与制作，由“梁祝之父”何占豪担任音乐总顾问，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编剧，国家一级编导马志广担任总导演，国家一级作曲刘岩作曲。

“杂技和舞蹈有相似之处，但具体节目的技巧和编排是不同的，这就很考验导演和演员功力。”赵建刚说，杂技剧《梁祝》能深入人心，一方面原因是梁祝故事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十分接地气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剧组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新元素和亮点，增加了戏剧冲突。比如在传统故事中，梁山伯是翩翩才子、文弱书生，最后相思成疾而病逝，而杂技剧中梁山伯则是文武双全，仗义胆，既有柔情，亦有侠骨的山东人形象。

老师教学生写字的情节，被设计成“飞叉”技巧的舞毛笔。除梁祝爱情主线之外，剧中突出了梁山伯与马文才的矛盾冲突，体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马文才与梁山伯的对决，设计



长镜头

新密打虎亭汉墓的主人是张让

汪海波

打虎亭汉墓所在的新密县，东汉时称密，属于河南尹。密县与颍川郡为邻，史载“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”，说明他们家族的祖茔本在颍川。但是，作为一个阉割出身的宦者，张让死后是没有资格入葬祖茔接受后人祭祀的，只能在相邻的密县另置新茔地。

张让掌握权力长达30多年，他的父兄子侄遍布州郡，颍川张氏族人中自然不乏生前依附张让，死后也陪他入葬密县新茔地的人。在缓水流经的狭长的平原台地上，张让墓家居其开阖的中部，最为壮观。

张让族人兄弟把持地方，造恶多端，史有明载。桓帝时，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，因犯法逃到京师，藏在张让家的密室“合柱”中。司隶校尉李膺破密室，捉住了张朔。

从名字上看，张让和张德更像是兄弟俩，张德字伯雅，很可能是张让的兄长。史书上找不到弘农太守张德的名字，阙氏虽然看到墓碑，但语焉不详。例如说张德是“河内密人”，其实密县不属河内郡，记载多有误。有可能是张德死后，张让为他的兄长向皇帝求来的“加官”，是追认的二千石大夫的“哀荣”。

张让有机会为家兄营造墓室，同时为自己预先准备墓地。中平二年（185年），南宮云台殿和乐成殿门火灾，张让、赵忠等趁机劝灵帝，让天下田亩加税十钱用以修葺宫室。宦官奉诏验收木材、石料，他们从中谋私自肥，把好的砖石木和技术工匠，都调去营造自己的私宅和墓室去了。这些宦官的墓室工程浩大，堪比帝王，而宫室却无人问津，连年不成。

从打虎亭M1画像风格上看，张让墓室画像的画师应该是黄门画者、宫廷画工里的顶尖高手。M1墓室里的人物故事画像约有30多幅，共200多人，反映了张让在现实生活中的

方方面面。史载张让的家奴倚势弄权，收受贿赂，卖官鬻爵，送礼求见者络绎不绝。在墓室首先可以看到宾客盈门，家奴索要贿赂和拜谒者跪献礼单的生动画面。

大宦官都有他们名义上的妻妾，墓主张让和他的妻子坐在榻上，有一监奴秉烛，张让在灯下观看监奴送上的名刺（名片）和送礼清单……墓主到死都忙着收礼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反映了权宦道德沦丧，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极度扭曲变态（图①）。

还有几幅有趣的画像。北耳室有3个女仆正向室外传递的垃圾，被靠近门口的女仆接过，丢进一个狗形的陶制垃圾桶中。这个狗形垃圾桶，大概是最早的“艺术造型垃圾桶”了（图②）。

南耳室有一个“猴面人”驯马，拴马桩上和马背上，还有几只猴子在戏耍。大概猴子有“避马瘟”的神奇功效吧——“孙悟空”的形象呼之欲出，令人称奇（图③）。

据嘉庆十七年（1812年）所立的《常十家图记》碑文记载，墓主人姓常名十，打虎亭村民习惯称墓家为“常十家”，民间还流传着“常十救驾”的传说：刘秀率兵攻打王莽失利，逃经农户常十的家里。常十换上刘秀的衣服继续奔跑，王莽追赶常十，刘秀从而得以脱险。后来刘秀做了皇帝，为了报恩，建了一座报恩庙，把打虎亭一带封给常十用做家族墓地。巧合的是，在距此仅40公里的嵩山少林寺，也流传着一则救驾与报恩的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的故事，因电影《少林寺》而闻名遐迩。

谁是谁非且不论，民间传说里极可能隐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。少林寺确有“十三僧助唐”，得到唐太宗封赏的碑记，证明故事里有一部分是史实。从清代流传下来的碑记和民间

传说来看，墓主“常十”，应该是“常侍”的讹音，实指东汉末年的“十常侍”。M1的墓主应该是张让，“常十家”实为“常侍家”。

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灵帝崩。袁绍与大将军何进合谋诛杀宦官，密谋泄露，张让、赵忠等宦官反杀何进。袁绍兄弟闯宫，冲进皇宫捕杀宦官，张让无路可逃，被迫投河自杀。

第二年，董卓迁都长安，洛阳方圆100公里绝无人烟，张让尚未完工的墓室从此荒芜。清代曾有人打开墓穴验看，发现墓室内空无一物。发掘报告称墓室“被盗一空”，其实，打虎亭汉墓本来就是两座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空冢。

明清以来，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当地人没有把“十常侍”与“常十家”联系起来，也许他们不情愿承认张让就埋在自己的家乡，而是演绎出更加理想化的、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“救驾与报恩”的故事。无论怎么说，经历了1800多年的风雨沧桑，打虎亭一带的百姓还保存着“常十”的记忆，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